

曹应旺 著

周恩来

中国外交第一人



毛泽东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

邓小平说：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上有重大贡献。

山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说：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上有重大贡献。

C3

中国外交第一人

周恩来

曹应旺 著



责 编：周 红
赵 玉
复 审：于辅仁
终 审：崔元和
责任印制：李 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曹应旺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8
ISBN 7-203-03880-7

I. 中… II. 曹… III. ①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②周恩来-生平事迹 IV. 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3227 号

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

曹应旺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46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203—03880—7

J·963 定价：18.80 元



曹应旺

生于1951年。籍贯安徽怀宁。

1985年前，当过兵，务过农，教过10年书。

1988年获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10年来，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瞭望》、《大地》、《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水利》等报刊发表作品80余篇，其中有6篇论文为《新华月报》、《新华文摘》转载，有3篇传记作品为《作家文摘》转载。

著作目录

《周恩来与治水》/1991年

《周恩来的智慧》主编并主要执笔/1994年

《伟人诗交》主编并主要执笔/1994年

《邓小平的智慧》主编并主要执笔/1995年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1996年

《周恩来经历记述》/1998年

《周恩来经济文选》副主编/1993年

《业绩·方略·情怀》副主编/1994年

《周恩来军事文选》副主编/1997年

《周恩来大辞典》副主编，统稿人之一，思想篇主编并主要执笔/1998年

《一代伟人周恩来》第五章作者 1998/年

《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1999年

目录



评 说

- 毛泽东在外交上对周恩来的倚重..... (3)
- 邓小平心中的周恩来和他的外交..... (12)
- 老外交官赞美周恩来外交..... (26)
- 诗人和海外华人赞美周恩来外交..... (39)
- 外国领导人评说周恩来外交..... (52)
- 国外传媒评说周恩来外交..... (69)

溯 源



- 中华文化与家庭的影响..... (83)
- 早年学校教育的影响..... (96)
- 留日旅欧,从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 (109)
- 建国前外事工作经验的积累..... (120)



业 绩

- 签订中苏新约..... (141)

- 抗美援朝 (152)
- 在日内瓦 (166)
- 在万隆 (177)
- 第一次大出访 (190)
- 第二次大出访 (197)
- 第三次大出访 (203)
- 中法建交 (210)
- 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晤 (217)
- 同尼克松握手 (225)
-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237)



智 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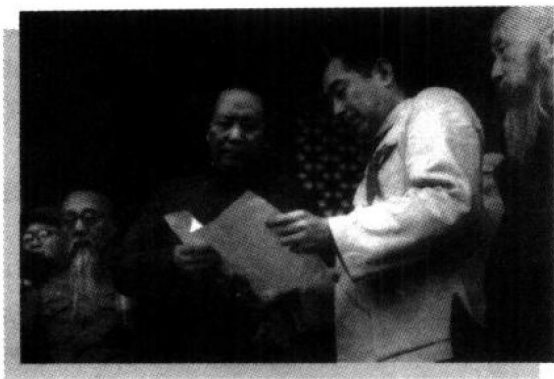
- 独立自主 (249)
- 和平共处 (259)
- 求同存异 (267)
- 以大事小 (275)
- 修睦四邻 (285)
- 守诚讲信 (295)
- 谋定而后动 (302)
- 尚礼好客 (309)
- 礼尚往来 (319)
- 天涯处处有芳草 (327)

中国新闻人
1979-2009
十年
★

评说

pingshuo





1949年10月1日，和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在外交上对周恩来的倚重

1964年初冬，著名儒学大师马一孚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与周恩来。

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菽粟如水米，能以天为一家。”

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

这两副诗联表达了马一孚先生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敬仰。同时，这两副诗联的区别，也透出这位理学家对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分工合作、协力共事关系的深刻认识。赠周恩来诗联中的“讲信修睦”，显然是称赞他的外交才能与外交贡献。

无独有偶，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时，也特别指出，周恩来在外交领域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美籍华人张大卫博士说：“周恩来作为一个忠实的总理，他弥补了毛泽东在外交事务和技术现代化方面的经验不足，在这两个领域，他

在其生命有限的最后几年内，似乎提出了他自己的紧急倡议。”^①

当然，包括外交在内，从整体上看，毛周关系自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到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一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有一个细小的鲜为人注意的事例，可以透视毛周之间的这种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时，这支队伍的代号称“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

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

“我叫什么？”任弼时说。

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李得胜”和“胡必成”，这两个名字涵义非同一般。

毛泽东是哲学家，他给自己取的代号，亦具有哲人之思。“李”与“离”同音。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退避三舍，后发制人。暂时离开延安是为了全局性的胜利。

中国自古就有蓄须明志的传统。周恩来自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蓄须，长征直到陕北后胡子又黑又长，人们常以“胡公”、“大胡子”相称。西安事变后考虑到统战工作，他才把胡子剪了。周恩来给自己的代号取姓“胡”，或许正出于此。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习俗，男子二十而冠，成年后即可依据本名之涵义而另立别名，称之为字。名与字之间要相互关联。“润之”是依“泽东”之名而立的字，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号。“润”与“泽”字义相近，均可理解为滋润之意。周恩来字“翔

^① 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5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字”，小名“大鸾”。“大鸾”，类似凤凰的一种神鸟。“来”，至也。“翔字”，即在宇宙中翱翔，“大鸾”、“恩来”和“翔字”，均有飞翔之意。

“李得胜”与“胡必成”，分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的代名。然而，合而言之，“得胜”与“必成”犹如一个人的“名”与“字”或“字”与“名”，字义相近，意思相通，相互关联。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却恰当地表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相辅相成、长短互补、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世界最小最简陋的指挥部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一个主战略思考，一个主组织实施。凡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之后，如何组织部署、如何贯彻执行的事都由周恩来具体来抓，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政治上合作的一个象征，也是毛泽东、周恩来携手创作的一件艺术珍品。这座纪念碑碑名由毛泽东手书，碑文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毛泽东的手书龙飞凤舞、不拘一格、挥洒自如，周恩来的手书藏锋守锷、内方外圆、井然有序。瞻仰者无不两种手书各尽其长，结合得天衣无缝而叹为观止；也无不毛泽东、周恩来合作共事互为表里，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无限感佩。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① 还有一位哲人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② 周恩来与毛泽东处事中的协力，是和而不同的协力，是差异互补的协力。这种协力的效果，不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而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

① 《老子·二章》。

② 《左传·昭公二十年》。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开始于北伐前夕的广州。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曾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毛泽东也曾到黄埔军校演讲，一张发黄的当年报纸上刊载过类似消息。“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毛泽东曾在李富春家中讨论反击问题。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时，杨问：“周总理，您什么时候认识毛主席的？”周恩来说：“1925年认识的，1931年以后就同主席在一起工作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有许多评价，其中，1949年5月，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阐述。这篇文章已收入1980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题目是《学习毛泽东》。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虽然没有“学习周恩来”的大块文章，但涉及的面很广。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最早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他在黄埔军校所创立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及重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对后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10月，毛泽东总结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军队工作方面的经验时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为一个军，影响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军队改变了新面貌。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380页，人民出版社，1991。

周恩来传

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党内的职位和名望高于毛泽东。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遵义会议情况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他日理万机，忘我工作，各行各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建设，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称赞周恩来：“周公确有吐握之劳。”^②

1956年周恩来对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倾向，多次进行耐心的说服和认真的批评。他因此在1958年初受到不公正的严厉指责。批评反冒进、掀起“大跃进”后，各地追求高指标，竭泽而渔，搞得有些地方的老百姓揭不开锅。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个余地，多么好啊！”^③

从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看，毛泽东倚重周恩来特别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外交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不仅充分信任，而且多有出自肺腑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接着，毛泽东说：有两个人是要提出报告的，即我和恩来是否参加政府工作。“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④。

毛泽东首荐周恩来担任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内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3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352页，人民出版社，1983。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214~2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915页。

阁总理”，这无疑是从整体上对周恩来治国才能的肯定。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历史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理都必须擅长于外交事务，新中国亦是如此。毛泽东选中的“内阁总理”，首先亦出自于对他的外交才能的了解、信任和肯定。

50年代，李越然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俄文翻译。据他回忆，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介绍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①

这段话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外交的总体评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毛泽东同斯大林会面时，斯大林问道：“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毛泽东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看一看。”^②

当毛泽东想到商谈和签订中苏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向斯大林表示“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时，斯大林曾感到惊讶和不可理解。在斯大林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才是两国门当户对的领导人，有什么条约、协定不可由斯大林、毛泽东直接商谈、签字呢？

几天后，尽管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但他仍未能理解毛泽东提议的周恩来此行的真正意义。

周恩来到莫斯科之后，条约和几项协定文本都由周恩来准备。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③

周恩来井然有序，出色地完成了商谈、签订新的条约和几项协定的任务。此时，斯大林才悟出了毛泽东提出要周恩来来一趟

① “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周恩来》，5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②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③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451页。

的用意，才真正理解了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重大外交活动而到莫斯科的周恩来一行不可缺少的作用。

上述新中国成立后最为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的始末，最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在外交上对周恩来的倚重。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的重要国际会议。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瑞士日内瓦。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苏联、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讨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6月下旬至7月初，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中途休会之间隙，到印度、缅甸两国访问，并赴中国南宁围绕恢复印度支那三国和平问题同越南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举行会谈，交换意见。然后，周恩来返回北京，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日内瓦会议、访问印度和缅甸、举行中越会谈的情况。听完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对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所取得的外交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周报告很好，同意他说的方针并批准过去两个多月的活动。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①

为维护国家独立，洗刷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次会上，周恩来根据他亲身观察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提出：“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看法，肯定道：“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②

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恩来又于1955年4月出席万隆会议，为开展中国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不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131～1132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147页。

★
中国历史
人物
小史
卷一

仅使新中国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和风格展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而且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国家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说：“直到日内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形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①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说：“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②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的乐观看法，也包含着对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所起的积极作用的肯定。

“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外交工作仍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彻底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被排斥在重要国际机构之外的不正常局面。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朝正常化的方向发展。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所有这些，既与外交家周恩来的努力分不开，也与毛泽东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外交工作依旧坚定不移地倚重周恩来是分不开的。

大动荡的1967年，极“左”思潮也曾严重冲击周恩来主管的外交工作。这年8月7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公开支持“打倒陈毅”，煽动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时人称这个讲话为“王八七”讲话。第二天，王力将讲话内容分别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236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青作了汇报，得到陈伯达、江青支持。“王八七”讲话出笼后，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劝说、批评与警告，冲击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外交部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受王力等支持的造反派还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冲击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等多起严重的涉外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于8月23日凌晨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批评他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

当时，毛泽东在上海。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把“王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杨转送毛泽东看。周恩来针对“王八七”讲话煽起的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气愤而又担心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杨成武于当天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经过一夜的思考，下决心处理给外交工作造成混乱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二天，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对“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道：“大、大、大毒草。”^①26日中午，杨成武又飞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随即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对王、关、戚的处理，虽未能解决“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但减缓了极“左”思潮的破坏程度。特别是搞臭了“王八七”冲击外交工作的讲话，制止了极“左”分子对外交工作的倒行逆施，依旧保持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外交的倚重，从而为70年代打开外交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